

企业化的农村股份制集体生产模型

李红亮

(西南交通大学 国际经济与贸易系, 四川 成都 610031)

【摘要】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曾经大大提高了我国农业生产力,但其自身也存在弊端。随着农业的发展,它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农业生产率的进一步提高。本文以四川省西昌市为例(很大程度上代表了西部农村的发展状况),从多方面深入分析了农业生产率受到桎梏的原因。笔者对这个突出的问题进行了调研、分析,并提出了“企业化的农村股份制集体生产模型”的设想。这种生产模式能节省大量劳动力,使农业剩劳动力不再被束缚在土地上,并且自身具有融资能力,能解决农业机械化过程中的资金问题,并能产生规模效应,提高农业生产力。

【关键词】 企业化; 农村股份制; 生产模型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91(2005)04-0121-05

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13亿人口中有大约9亿是农民。只有农民摆脱了贫困,我国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共同富裕。而实际上农民的收入问题日益困扰着中国。国家的经济在增长,人民的生活水平在提高,但同时城乡居民的贫富差距却在不断加大。2000年城乡差距为1:2.79,如果考虑到官方公布的数据的水分,加之城市居民享受的各种福利(如福利住房,公疗,单位发放的实物等隐性收入)其真实差距可能达到1:5。究竟是什么因素桎梏着农民收入的进一步提高呢?笔者带着这问题,在从2002年底到2005年1月的这段时间里,三次在从四川省西昌市的西郊乡,小庙乡,西乡乡,安宁镇和琅环乡当中的9个村近300户农民中进行了调查,对这个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

西昌市地处四川省西南的凉山彝族自治州。人口56.88万,其中城市人口19.11万,农村人口37.7万,分别占总人口的33.7和66.3%。2002年国民生产总值523112万元,人均GDP7500.2元,西昌市耕地面积775890亩,占总面积的19.48%,粮食作物在安宁河谷地带以水稻、小麦、胡豆为主;在二半山地区以玉米、洋芋、荞子为主。

二元经济结构的特征十分明显。西昌市绝大部分农民家庭种植的都是粮食作物。而粮食作物的价格本来不高,其收入——尤其是农业收入非常低。例如调查中西乡乡三柏村的一位有20多年中种地经验的农民李某,就给我算了一笔帐,种植水稻和小麦(四川地区的耕作一般为一年两季,春种水稻——称之为“大春”,秋种小麦——称之为“小春”),一季大春的投入和收入如表1(在不交纳农业税的情况下):

一亩地一季大春的纯利润也就是300元不到。

1 现实状况

表1 种植水稻的投入和产出

投入	谷种	薄膜	肥料	犁地	农药	播种、插秧、管理、收割、晒制及加工的人工	合计
	25元	10元	90元	80元	20元	300	535
收入	风干稻谷600公斤左右一约800元						800

季小春的收支如表2:

一亩地一季小春的纯利润同样也不到300元。也就是说一个农民一年的农业收入尚不足一名中学生

一年的学费。

在这样的情况下,西昌市农村也出现了进入城镇或外地打工的热潮。其形式多种多样,如从事建

收稿日期:2005-10-18

作者简介:李红亮(1983-),男,西南交通大学学生。

表2 种植小麦的投入和产出

投入	麦种	肥料	犁地	农药	播种、插秧、管理、收割、晒制及加工的人工	合计
	30元	90元	60元	10元	120元	310
收入	风干小麦400公斤约600元					600

筑工人,搬运工,司机,家政清洁工,保姆等职业。尽管这些都是比较下层的职业,但许多民工往往一个月就能挣到一亩地一年的收入。正是这个原因,在调查农村人口的年龄结构时,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统计结果。下面是从西昌市中的九个村抽出的农村家庭共计1475人的抽样调查统计:

长住的农村人口中,0~6岁的幼儿占8.5%,6~18岁的(绝大部分是学生)占48%,18~45岁的精壮劳动力仅占17.6%——其中妇女的比例达87.1%。而45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占25.6%。因此有人戏称农村为“61~38~99部队”。18~45岁的劳动力中,女性的63%,男性的94%不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因此61,38,99就分别代表长住于农村最大的三个部分的人口——儿童,妇女,老人。其中,袁家山村某组,18~50岁的人口100%全部从事打工赚钱的劳动,由于种植粮食的利润远远低于打工所能赚的钱,因此他们或将田地租出或不种,日常生活中就购买粮食。这就是西昌市农村中普遍存在的一个奇怪现象。

而外出打工的民工也面临很多的难题。一方面他们不能脱离农村的土地,一般来说一户家庭不会所有的人都出去打工,因为他们不能脱离他们的土地,这是他们农民的身份所决定的。另一方面,他们在进入城市的过程中会面临重重的障碍。首先是制度上的因素,城市里的很多职业民工都不能从事。其次是他们子女的教育问题不能得到满意的解决。要么因为户口问题,要么因为他们无法支付昂贵的费用。所以民工外出打共只是“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因此他们不得不像候鸟一样在家与打工的城市之间来回的迁徙。这样的民工潮给国家的交通运输部门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正是打工的收益远高于农耕,所以农民外出打工也是一种理性选择的结果。工业工资水平高于农业劳动者的收入水平是农业剩余劳动向工业部门流动的直接动因。其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农业耕作的低效率和低利润率。

2 农业低效率原因分析

自从1981年西昌市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

后,农民获得了土地的使用权并自主生产。于是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而主动改善耕地质量,积极改进生产工具,提高生产技术,以提高产量。在这种形式下,农民的劳动生产率,粮食的产量和农民的生活水平都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因此在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以后,一定量的劳动就只需要较少的一部分人就能完成。根据上文西乡三柏村李某的数据,一个农民一年花在一亩地上的时间总共加起来还不到30个整工作日。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农民的地都用来种植粮食,那么他一年有11个月的时间(当然不是连续的)是处于农闲。于是在农村耕地不能增长的情况下,就产生了一部分相对过剩人口不需从事农业劳动。而且从事农业劳动的农民的劳动时间由于生产率的提高而大大减少,他们也能获得很大一部分不必从事农业劳动时间。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一部分农民脱离了劳动,这就成为大量农民外出打工的可能性。

虽然一方面我国的农业生产率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但另一方面,它却还仍然远远低于世界先进水平。究其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中国农民的人均耕地面积很少,人均仅1.2亩,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的农业生产是以家庭为基本生产单位,因此耕地被分得十分琐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也限制了农业生产的规模。因此根本无法产生规模效应。生产成本无法进一步下降。

第二,在调查过程中,我们了解到很多农民仍在使用牛耕这种古老的方式,在农业劳动时,大多还是肩挑,背扛,手挖——几乎是全手工操作。并不是由于我们国家缺乏先进的设备和技术,而是由于每个家庭的耕地面积很小(平均每人大约只有1.2亩),大型的机械化设备根本无法运用,因此在农村就只能普及小型的机械化生产甚至保留了许多原始的生产方式。即使可以使用小型机械化设备可以使效率提高,并使他们有能力耕种更多的土地,但是他们始终只有大约平均每人1.2亩的土地,所以他们并不需要很高的生产效率。

第三,农村存在着巨大的人力资源浪费。因为在现在的技术水平下,每个农民的耕种能力远远不止

1.2亩。因此,农村存在数额巨大的剩余劳动力。目前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总规模在1.5亿左右,而随着劳动力数量的持续增加,剩余劳动力的绝对量也将不断增加。假设按照这个比例,西昌市则存在4.3万的剩余劳力。尽管他们可以在上述除耕作时间外的11个月中外出打工,但还是被束缚在了土地上,无法完全脱离土地。加之一部分农民在城里根本就找不到工作。这些人就构成了农村的隐性失业人口。

第四,在完成该作品的过程中,偶然发现还可以用一个概率模型严格地从数量上来解释低效率。在西昌农村,有很多农户种植洋葱。由于洋葱种子价格昂贵,每家农户都要在葱苗长好时和种子成熟时进行看守,以防被盗。我们作这样的假设:有80块葱地,每块葱地被盗的概率为0.01。我们用下面两种方法来看守:(1)由4人看守,每人负责20块葱地;(2)由3人看守,共同负责80块葱地。我们来比较两种方法下面,发生被盗事件而没人及时处理的概率:(1)按第一种方法,记X为“第一人看守的20块葱地中同时发生被盗事件的葱地的块数”; $A_i(i=1,2,3,4)$ 表示第i人看守的20块葱地中同时发生被盗事件。那么,当每个人看守的葱地有两块或以上的葱地发生被盗事件时,他将不能及时处理。此时X服从二项分布 $B\sim(20, 0.01)$ 则80块葱地中发生被盗事件而不能及时处理的概率为:

$$P\{X \geq 2\} = P(A_1 \cup A_2 \cup A_3 \cup A_4) \geq (A_1)$$

而根据二项分布概率公式:

$$P(A_1) = P\{X \geq 2\} \approx 0.017532$$

$$P\{X \geq 2\} > 0.017532$$

即80块葱地中发生被盗事件而不能及时处理的概率大于0.017532

(2)按第二种方法,记Y为“80块葱地中同时发生被盗事件的葱地的块数”此时Y服从二项分布 $B\sim(80, 0.01)$ 。故80块葱地中发生被盗事件而不能及时处理的概率为:

$$P\{Y \geq 4\} \approx 0.0098$$

于是我们看到,第二种方法出现“80块葱地中发生被盗事件而不能及时处理”的情况的概率(0.0098)远远小于第一种(0.017532)。然而,第一种方法却要比第二种多一个人。换句话说,在这种情况下,三个人共同完成一个任务的效率却比四个人单独完成要高的多。

上面只是用数学严格的证明,而现实中的情况比这个更糟。村民们并不是一人看守20块葱地,而是

一人看一块。那么八十块葱地就会需要80个人看守,而这种偷盗事件又是小概率事件,实际上,如果这80块葱地是一家人的话,他就可以将葱种植在同一片地里,那么只需要一个人看守就行了。所以在这个例子中,他们的方式每天就浪费了79个劳动力。因此,这种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方式在许多情况下导致了低效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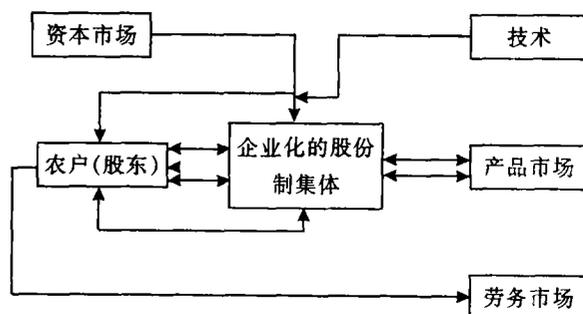
3 企业化的股份制生产模式

在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提高农业生产率的过程中,农业机械化 and 农业科技化是两条必由之路。我们来分析一下要实现这两个目标需要的条件。

首先,生产规模不能太小,否则耕作每亩土地的边际成本非常高。第二,资金和技术问题的解决是一个必要条件,大型的机械设备和先进的科学技术靠农民家庭根本无法办到。第三,人力资源问题。虽然第一和第二可以解决,但是,农民本身并不具备现代化生产的素质。所以,我们还需要相当的专业人才。

而企业化的股份制生产恰好可以适应现代化生产的要求。我们来看这样一种模式:首先将农村企业化,形成一个相当于企业的集体组织。在这个组织里,有决策机构,有监督机构,有技术工作人员,农民将土地以股份制入股的形式集中,是这个股份组织的股东。

企业化的股份制生产模式可以直观的由下图表示:



这样的企业化的组织较之于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有以下优点:

1.这种模式可以节省大量的劳力。以机械化的生产代替手工劳作,其效率可以提高数倍甚至数十倍,经济效益大大提高。就拿农民李某的种植经验来看,一年若种植一季大春和一季小春,总共需要的劳力为21人/天。举个例子,假设机械与人工的效率比

例达到4:1,那么如果采用机械化的生产,那么一年就可以节省15人/天(按西昌市农村的劳力价格大约300元),这个成本相当于一亩地一年收益的大约50%,大大提高了收益率。采用这种方式后(如果其它条件不变),这个企业化的组织将农民按原来的方式能获得的收益全部支付给农民后,每亩地还会有大约300元的收益。从农民的角度来看,他就不必从事农业劳动,仍能获得和原来一样的收益,甚至还有红利。

2.农民将土地集中后,部分农民将不再从事农业生产劳动,可以不再受土地的约束,特别是农村中的剩余劳动力将被解放出来。

3.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实现这种机械化生产?其最关键的地方是资金——单户农户根本无从获得的资金。而股份制的模式却可以解决。这个企业化的集体组织即可以通过内部进行融资,也可以进行外部融资,例如银行贷款,融资租赁,达到一定规模后甚至可以发行债券,发行股票,吸收投资。那么,有资金作为基础,这个集体组织就可以引进先进设备,先进技术和专业人才。农业将实现专业化,机械化,现代化,生产率将大大提高。

4.发达国家的农业产品只有很少部分是不经过加工而直接进入市场的,相反,西昌市的农产品只有很少部分是经过加工和再加工进入市场的。而现在主要农产品由过去的短缺状态向结构性过剩转变。由于我国小规模、分散性的家庭农业生产缺乏与市场更加有效的沟通机制,所以在产品的流通过程中就存在一个“剪刀差”。而采取这种模式以后,这个企业化的集体组织或者直接与厂家挂钩,可以进行专业的加工和再加工。然后农产品在进入市场。这样可以大大减少交易成本。另外,进行产业化的生产可以促进农业的专业化,并抑郁塑造农产品品牌,提高竞争力。同时,这种企业化的集体组织以及农产品的加工和再加工产业还可以吸收摆脱土地束缚的农民,为他们提供就业机会。这样,农民既是股东又可以是员工。5.我国农业人口虽多,但是他们虽然是生产的主体,但不占市场经济的主体地位,属于弱势群体,靠单打独斗很难在市场竞争中取得优势。这种企业化的生产模式可以大大提高他们在市场竞争中的竞争力。

6.有利于农村吸收高素质人才。农业自身的特点要求这种企业化的集体拥有比非农业企业更为丰富的组织资源,更强的创新能力,才能克服农业具有

先天性的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对产业化发展的限制。然而在调查中,没有一个农民受过大学教育。大学生毕业之后一般也不会选择农村,原因很简单,一是收益太低,条件太差,二是农村根本没有他们的用武之地。但在企业化的经营模式下,农业的机械化和科技化生产将大大增加对高科技人才的需求。农业人员素质的提高将对农村生产力水平的飞跃作出重大贡献。

在西昌,也出现过类似的生产模式。西昌学院农学系的李成佐教授就尝试了一种“高校+农户”的模式。在他的模式下,他与农户建立了一种契约关系,他为农户提供技术指导和部分投资,并负责组织管理以及市场营销;同时由农户进行生产管理。这种模式做到了科技与农业的结合,农业与市场的结合。取得了不错的效益。但是,这种模式以及一些“公司+农户”的模式并没有做到生产资料的结合和耕作方式的改进,农户仍然是分散生产,给组织管理带来巨大的困难,也无法产生规模效应。

另外,还出现了“家庭农庄型”的生产模式。个别具有雄厚经济实力的农户对土地进行承包,进行经济作物的种植或养殖。也取得不错的成效。这种模式具有一定的规模效应,而且将土地的出租人从农业生产中解放了出来,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专业化。但缺点在于这种“家庭农庄”缺乏技术支持和资金支持。

较之这些集体化的经营模式,这种企业化的股份制经营模式显然更具有优势。

4 注意的问题

1.必须有一个监督机构对这种企业化的集体组织进行规范与监管。必须保证农民应有的权利不能受到侵害。同时,其内部也必须有一个监督机构,对该集体组织的管理者进行监督。而由每个农民股东组成的股东大会应该是这个机构的最高权利机构。他们对集体组织的重大事务进行民主表决。

2.国家必须对该企业化的经营范围进行监管,从某种程度控制其经营范围。因为粮食生产始终关系国民生计。从1998年到2003年,粮食产量从2亿吨下降到1.7亿吨。而粮食价格上升是CPI上升的主要因素,它对CPI的上升的贡献率一直保持在71%-94%。粮食价格的波动对CPI具有重要的影响。如果不对这种集体组织的经营范围进行一定限制,将会

造成耕地面积减少,粮食供求紧张,进而导致CPI的增长影响国民经济的运行。

3.必须正确地处理这种农业股份企业化与土地流转的问题,并正确处理集体与农户的关系,遵循“自愿,依法”的原则,保障农民的权益。

4.尤其重要的是,必须将这种生产经营模式与城市化紧密结合起来。因为由于生产效率的大大提高,农村的剩余劳力必定会从农业生产中转移出来。如果不合理安置这部分剩余劳力,将增加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5 结论

西昌农村的农业生产状况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西部地区农业状况。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大大提高了

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得农业生产率和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使农民解决了温饱,也曾经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然而,在市场经济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农民处于社会的弱势地位,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这种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方式却从另外一个方面限制了农业生产的规模,阻碍了农业的机械化和现代化进程。同时,农村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他们在进入城市的过程中却又不能摆脱土地的束缚。基于上述情况,一种企业化的股份制集体生产模式能使农民中的剩余劳力从土地上解脱出来,并有利于实现农业的专业化,机械化,大大促进农业生产率。同时,企业化的股份制集体自身、农产品的加工产业以及与这种企业化的股份制集体挂钩的企业能吸收一定的剩余劳力。与此同时,这种企业化的股份制集体也必须加以监管以及规范,才能保证农民的利益和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 [1] 李裕奇,何平.该率论与数理统计[M].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01.
- [2] 刘红忠.投资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 [3] N.Gregory Mankiw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 [4] 高鸿业.西方经济学[M].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 [5] 谭崇台.发展经济学概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
- [6] 中国人民银行专题课题组.中国金融.2005(2).

Rural Collective Production Mode in a Form of Corporation with Shareholders

LI Hong-Liang

(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 Chengdu 610031, Sichuan)

Abstract: The household output-related contract responsibility system has once greatly improved China's agricultural productive forces. However, it owns itself disadvantages in that it hinders, to a certain extent, further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Taking the city of Xichang, Sichuan province as an example, which largely represents the overall situation in rural areas of western China, this article made a multifold and thorough analysis of reasons why productivity has been shackled. On a basis of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f this problem, the author put forward a tentative concept: a rural collective production mode in a form of corporation with shareholders. This production mode can save a considerable amount of labour by liberating rural redundant labour from farmlands, finance itself to implement agricultural mechanization, and produce domino effect so as to enhance agricultural productive forces.

Key words: Enterprise; Rural stockholding-mechanism; Production mode

(责任编辑:李道华)